

平淡也是一種活法

鄰居的小孩職高畢業，在一家快餐店做店員，月薪不高，但小伙子很快樂，認為自己學到了不少新東西，還交到了一些新朋友，這樣的生活很符合他之前的期待。可是他的父母卻不這樣認為，總是責怪孩子沒有出息，整天在他面前念叨，誰家的孩子工作好、薪水高，都開始供房了；誰家的孩子做生意很厲害，掙錢大把大把的……這樣做的結果，就是使得雙方的關係難以相合，父母的精神緊張，孩子也很痛苦。

上述場景可謂是當今社會最為常見的一幕。改革開放數十年後，人們對於「成功」的追求，儼然已成為了一種社會性的焦慮，地位的高低、金錢的多寡，已是許多人衡量生活質量的基本元素。由於物慾的流行，功利的擴張，以及精神信仰的缺失，許多人徘徊在內心與現實之間，因沒有獲得外界所認同的「成功」，即使衣食無憂，也感覺不到一丁點的生活樂趣。所以，也不乏為了滿足虛榮和感官需求、甘心情願做物質奴隸的人，每天就像鐘擺一樣忙忙碌碌，卻從不肯稍稍停留一下匆忙的腳步，看一看、享受一下已有的生活。

南宋人洪邁的《容齋隨筆》裡記有一事：南宋寧宗年間，江西信州的官員無意中從地下挖出一塊唐代的石碑，是一位周氏女子為亡夫所作的墓誌和墓銘。墓誌稱其夫名為「曹因」，是鄱陽的世家子弟。曹因的祖父、父親都曾在唐高祖李淵手下為官，可是到了曹因這一代，卻三次參加科考而不第，只能在家做個禮義鄉紳。而且在婚後的第八年，曹因又因病客死於前往京城長安的路上，留下周氏孤兒寡母，獨自應對一大堆難以收拾整頓的後事。聞訊之後，與曹家有舊的朝廷公卿、鄉鄰耆舊，都很同情這一家人，為孤兒寡母歎息，認為曹因未能仕宦為官，就已屬不幸，如今又早赴地下修文，更是悲劇。

遺孀周氏卻不以為然，認為丈夫未能仕宦為官，獲得世俗的成功，並非不幸，因為平淡的人生也是生活的一種形式。至於生死，乃是人力無法控制的事情，也不必為之歡喜或悲傷，只須順乎自然即可，只要家裡還有田地，就能過活，丈夫生前讀過的書，也可以用來教導孩子。所以，周氏為丈夫曹因作墓銘：「其生也天，其死也天，苟達此理，哀復何言！」表達自己不認同世俗既定價值準則、豁達對待一切變故的生活態度。

周氏為亡夫撰寫的墓誌和墓銘，被宋人掘出後，觀者無不感歎周氏善於從平淡人生尋求美好的獨立人格及生活範式，於是特地將這件事情記載下來，勸諭後人。

古今同理，成功固然是值得人們奮力追求的目標，但平淡也是一種活法。畢竟幸福只是一種主觀感受，並無物化衡量的標準，只要能從所處環境當中得到樂趣，就是幸福。

歷史空間

口才與人才

王兆貴

張釋之，字季，西漢南陽人。曾事文景兩朝，官至廷尉，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，被後人譽為西漢的法學家。

一次，張釋之隨從漢文帝出行。登臨虎園，文帝詢問簿冊上各種禽獸的情況，問了十幾個問題，上林尉張西望，全都答不上來。看管虎園的畜夫從旁代為應對，答得甚是周全。為顯示自己的才能，他回答起問題來如回聲相應，且無法問倒。文帝說：「當官的難道不該像這樣嗎？上林尉不可依靠。」於是就命張釋之提拔畜夫為上林令。

過了一會兒，張釋之上前說：「陛下以為絳侯周勃是怎樣的人？」文帝說：「是長者啊。」釋之又問：「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呢？」文帝又答：「是長者。」張釋之說：「絳侯與東陽侯都被稱為長者，議事時又都不善言辭，難道也讓他們像畜夫那樣喋喋不休地耍嘴皮子嗎？秦國重用刀筆之吏，官吏們爭着以辦事迅速苛刻督責為高，然而這樣做的害處在於徒具官樣文書而無實質內容。因為這個緣故，秦君聽不到自己的過失，國勢日衰，以至二世而亡，天下土崩瓦解。現在陛下因畜夫能言就越級提拔他，我擔心的是天下跟風，爭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實際。況且下效上行，比如影隨形還要快，皇上的一舉一動都將影響到天下人，不可不慎啊。」文帝說：「好吧。」於是就此打住，不再提拔畜夫為上林令。

這件事，見於《史記》張釋之馮唐列傳。《漢書》襲用《史記》資料，合併為張馮汲鄭傳。從司馬遷的記述中不難看出，他對張釋之的做法是認同的讚賞的。但若將整個傳記聯繫起來，全面進行觀照，太史公更看重張釋之的執法不阿和漢文帝的從諫如流。在能否提拔畜夫這件事上，張釋之的勸諫也只是一家之言，一面之理。

據咸陽史志介紹，秦漢時期的上林苑規模很大，總面積超過2,000平方公里。作為皇家園林，有一套嚴密的管理體系。西漢初年，上林苑由少府管轄，漢武帝時轉入水衡都尉。水衡都尉是個部門齊全的管理機構，屬官不下二十餘種。上林令是較高級別官吏，主管苑中禽獸，那個被文帝問倒的上林尉，主管苑中安全衛衛工作，而畜夫則專門負責虎園的日常事務。從責任分工可以看出，上林尉為甚麼會被問倒，而畜夫

卻能對答如流。

漢文帝來上林苑巡視，問苑中禽獸情況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其初衷並非考核官員。上林尉儘管不具備負責虎園管理，但作為上林苑的二把手，對苑中禽獸的大致情況總該了解一些，即便口拙，也不至於十問全不知。文帝對他不滿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相比之下，那個對答如流的畜夫讓文帝轉噴為喜，一時高興，立馬就要封官。對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來說，這樣做按說也不算甚麼出格的大事。

那個虎園畜夫，在上林苑是個底層小吏，難得有這樣的陞遷機會，表現一下自己也在情理之中；僅就熟悉本職工作這一點來看，他做得非常稱職，即便提拔他做上林令，也無明顯的不妥之處。對於畜夫來說，能見皇帝於當面，並受到稱讚與嘉許，這是多麼大的榮耀，多麼好的機遇啊！只可惜機緣不巧，碰上了張釋之「從中作梗」，將他一生中難得的一次好運給撞破了。在張釋之的官場閱歷中，這不過是小事一樁，微不足道，而對於畜夫個人來說，帶來的損失卻是百分之百。

再說啦，能說會道不等於口滑舌滑，能言善辯不等於巧言令色，我們不能把擅長辭令的人都說成是耍嘴皮子的。言論雖屬務虛，但也不見得就是空談，否則何來「言之有物」呢？作為語言表達能力，口才本身並不具有道德屬性，關鍵是看甚麼人用，用在哪裡，如何運用。同樣是餽糖，柳下惠說可用來盡孝道以養老，柳下跖卻說可用來粘門栓以行竊。

熟悉中國文官制度的人都知道，崇仰口才，倚重辭令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官場的一大特色，每個朝代的廟堂之上，幾乎都有那麼幾位伶牙俐齒的名嘴。這些名嘴雖然不都是一路貨色，有能臣也有弄臣，卻都能得到皇帝老兒的封賞。即便在民間，嘴上功夫好的人，混飯吃的路數也更多一些。靠口才賣藝立身，比及引車賣漿者流，地位不見得有多高，但錢要來得容易些。

戰國時期的張儀，被楚人疑為竊賊暴打了一頓，鼻青臉腫地回到家中，面對妻子的埋怨，他張開嘴巴問妻子：「你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？」妻子說：「在呀。」張儀說：「這就夠了。」張儀的意思是說，只要舌頭還在，就不愁沒有出路，就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。

口舌之於人，不僅是飲食吐納、社會交際的工具，也是謀求生計、施展抱負、開創事業的錢。事實上，不論過去還是今天，能說會道的人總是受歡迎的，他們在官場、職場上左右

逢源，陞遷的機會也比謫於言者多一些。就拿如今選拔公職人員的程序來說，筆試之後有面試，而面試成功與否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敏捷的思辯應對能力和流暢的口頭表達能力。正因為如此，書店中從來都不缺傳授語言藝術的專著，課堂上也不缺講授演講技巧的老師，學校裡也不乏進行口才訓練的學子。

人們之所以這樣看重口才，除了因為它具有功利層面的優勢外，還因為它能發揮物力難以發揮的作用。在許多智者看來，口舌的威力勝過拳腳，勝過刀槍。有道是「一人之辯，重於九鼎大呂；三寸之舌，強於百萬雄兵」。張儀、蘇秦者流，正是憑借三寸不爛之舌，思辨勸諫，拜相封侯，「不出樽俎之間，而折衝千里之外」，將口舌之勇演繹到極致。即便在今天，因口才好而使事業如虎添翼者也大有人在，如李肇星、余秋雨、白巖松、易中天、馬雲、汪涵、俞敏洪等。口才不僅能增強思辨力、說服力，擴大影響力，而且也可以轉化為生產力和戰鬥力。

當然，上邊的分析還是站在畜夫的角度，就口才說口才，着眼於口才的基本功用，未能立足用人導向的大局，用長遠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。人家張釋之站得高、看得遠，一席話把皇帝說服了。張釋之的擔心也不無道理，歷史上確有空談誤國的前車之鑒。那些「無事袖手談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王」的所謂忠臣，有幾個是實幹興邦的能臣？張釋之不同意提拔匯報工作頭頭是道的畜夫，是怕在用人問題上產生負面影響，這當然也應當引起我們的警覺。

僅僅是因為一次工作匯報，就受到前來本地調研的領導賞識，不久後擢升要職，從此官運亨通，青雲直上。這樣的事例發生的幾率儘管不高，卻不是個案，也不止於傳聞，說出來有名有姓，舉證者大有人在。中國演講學教授邵守義認為，是人才未必有口才，有口才必定是人才。但如果唯口才是舉，以匯報取人，就會在用人問題上產生誤導，讓那些誇誇其談的人鑽空子，使那些埋頭幹實事的人受冷落，以至於華而不實之風盛行。因此，選拔任用幹部要堅持德才兼備，重口才不惟口才，選口才也選幹才，既要要看表達能力，又要看實際能力，更要看綜合素質。



古時賢能多是善言辭者。



美國歷任總統均懷絕佳口才。

被命運安排的生活，突然給我自由，讓我選擇，竟然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。當然，我隨即否定了自己是「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」的可能，開始思考醞釀這件事。

大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，如果給他自由，他願意選擇生活在公元一世紀的新疆。原因是，彼時的新疆是一個多種文化交匯的地方。文人的腦袋瓜子轉得一般比較快，除了願意生活在二世紀的新疆，湯因比還想生活在宋朝。論原因，據說因為宋朝的開國皇帝曾經留下祖訓：本朝不得以言論治罪。這一條，比起被某些歷史學家反覆歌頌的康乾盛世要強多了，比明朝朱棣的血腥統治也強多了。

湯因比願意生活在宋朝，德國漢學家顧彬則喜歡唐朝。這一個喜歡給中國文壇找麻煩的刺兒頭說，他想到唐朝去，和李白一起生活。他說他懂得「孤帆遠影碧空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」的孤獨，如果見面，會請李白喝六十八度的白酒。說心裡話，懂得唐詩實在算不上甚麼，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就懂得「天際流」了。倒是請李白喝酒這件事情，頗能大醉之後，能夠像北宋梁山泊的好漢們一樣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喝醉了去文字的叢林裡廝殺一番……

如果是我。如果是我，我願意生活在沒有電燈的時代。千

今年廣東的高考作文，非常別致，出人意料，開出了《你想生活的時代》這樣有趣的標題。

這題目突然帶給我很多感慨。原因在於，我這個七零後，習慣了後，有些受

如果有一部時光穿梭機，你會選擇哪個時代呢？

網上圖片

末代皇帝們尚且如此，黎民百姓的日子就不要說了。東漢末年，十室九空。到了西晉，全國人口不過數百萬人。因為長期戰亂，死者十九。曹操在《蒿里行》中寫道：「千里無雞鳴，白骨露於野。至於唐朝末年，黃巢起義，軍中無糧，起義軍就抓住老百姓殺了吃。把人放到石磨裡磨成肉泥……」王明末世，慘不忍睹。

我算半個文人也。如果讓我選擇，我願意選擇生活在文藝復興的時代。因為那是一個文化自覺且充滿朝氣的時代，就像屬於中國的一九八零年代。我願意選擇盛唐，那個時代大街上酒店裡站滿了胡姬，金髮碧眼的美女們以及他們的家人紛紛到長安淘金。當然，選擇盛唐還有一個理由：那是一個文化上充滿自信的時代。大氣，無與倫比，百無禁忌。如果給我充分的自由，我還想到蘇東坡的時代去，聽東坡持鐵板唱大江東去……這樣的生活，才是真正開心快樂的生活。當然，我不會選擇兩晉，儘管阮籍的白眼很可愛，但那是亂世，江山不幸詩家興，顛沛流離，又有甚麼好？

萬年來，我們的老祖宗一直生活在黑燈瞎火的暗夜裡。每到夜晚，他們都早早休息。他們遵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模式，不像我現在，起得比雞都早，睡得比狗都晚。

現代科技的偉大力量，早就把我折騰成了一個愛失眠的傢伙。與我同樣經常失眠的，是此君乃環保節能的模範。

如果沒有電燈電話電視機電腦，如果沒有網絡，我最多晚上八點半就休息了。這樣，該死的胃腸也不會纏上我。我不喜歡生活在有現代科技的時代，儘管我充分享受了現代科技的種種好處。

如果給我選擇的自由，我不願意生活在康乾盛世和漢武帝時代，更不願意生活在每個王朝的末期。

漢武帝時代固然雄武，民間百姓付出的代價太大。為了打匈奴，國家府庫枯竭，民間十室九空。這樣的時代，足以滿足野心家的偏好，卻太不適合普通人的生活。

我不願意生活在康乾盛世。這樣的時代，一方面國家經濟迅速穩定，另一方面，文化領域萬馬齊喑，風聲鶴唳。我同樣不願意生活在每個王朝的末期。當年崇禎帝自殺之前，親手砍下了自己女兒的手，哭著說：「汝何故生我家？」這是何等的悲慘！《資治通鑑》裡，專門錄有南朝宋末代皇帝劉准的一句話，這個走投無路的皇帝說：「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皇家！」

你可曾站在夕陽裡
遠望過故鄉
你可曾坐在夕陽裡
想念過爹娘
你可曾走在夕陽裡
體驗過荒涼
路就在腳下
大地漸已蒼茫
誰知我的天使在哪裡
為何夢總是嚮往
家的方向

夕陽

宋樹桐

五樹閑話

我願意生活的時代

馮磊

萬年來，我們的老祖宗一直生活在黑燈瞎火的暗夜裡。每到夜晚，他們都早早休息。他們遵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模式，不像我現在，起得比雞都早，睡得比狗都晚。

現代科技的偉大力量，早就把我折騰成了一個愛失眠的傢伙。與我同樣經常失眠的，是此君乃環保節能的模範。

如果沒有電燈電話電視機電腦，如果沒有網絡，我最多晚上八點半就休息了。這樣，該死的胃腸也不會纏上我。我不喜歡生活在有現代科技的時代，儘管我充分享受了現代科技的種種好處。

如果給我選擇的自由，我不願意生活在康乾盛世和漢武帝時代，更不願意生活在每個王朝的末期。

漢武帝時代固然雄武，民間百姓付出的代價太大。為了打匈奴，國家府庫枯竭，民間十室九空。這樣的時代，足以滿足野心家的偏好，卻太不適合普通人的生活。

我不願意生活在康乾盛世。這樣的時代，一方面國家經濟迅速穩定，另一方面，文化領域萬馬齊喑，風聲鶴唳。我同樣不願意生活在每個王朝的末期。當年崇禎帝自殺之前，親手砍下了自己女兒的手，哭著說：「汝何故生我家？」這是何等的悲慘！《資治通鑑》裡，專門錄有南朝宋末代皇帝劉准的一句話，這個走投無路的皇帝說：「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皇家！」

亦有可聞

「門當戶對」

龔敏迪

多次聽人錯將古建築的抱鼓石與門簪指稱之為「門當」與「戶對」。按照古建築學家劉敦楨在《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》的考查，門簪一般都是一到二對，它和抱鼓石一樣，都不能表示門第的高下。

清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·群望》說：「自魏晉以門第取士，單寒之家，屏棄不齒，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。」所謂「書香門第」，是在東漢末年的動亂以後，那些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的家族，為社會所仰望，成為政治、經濟上的特權階級。而凡門第必有家學，無家學即不其為門第。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，也可以算是一種選舉制度，但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，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，於是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士族」就漸漸成了定局。到了魏晉南時期，出現了「王與馬共天下」的情況，皇帝也必須依靠他們的支持。

唐柳芳《氏族論》說：「郡姓者，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閥為之。」這些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自視甚高，所謂「士庶之別，國之章也」。梁武帝時，侯景上表要求娶王、謝大族之女為妻。梁武帝問書說：「王謝高門，非君之偶，可斟酌朱異、張綰以下諸大族的女兒。」氣得侯景發狠說：「待我得志，必將吳境子女全部配給兵士當奴僕！」王珣娶的是謝萬之女；王珣娶謝安之女；王僧達娶謝安之女，這就叫門當戶對。

《氏族論》說：僑姓以王、謝、袁、蕭為大；吳姓以姚、王、為大；山東郡姓以王、崔、盧、李、鄭為大；關中郡姓以杜、韋、裴、柳、薛、楊；代北虜姓則竇、元、長孫、宇文、于、陸、源。僑姓、吳姓、兩個郡姓加虜姓合稱四姓，「舉秀才，州主簿，郡功曹，非四姓不選。」以前大家都重視修家譜，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

北魏又有新發展，《夢溪筆談》說：「印度有種姓制度，自後魏據中原，此俗遂盛行於中國」，後魏佛教大盛，所以也想借鑒印度的這個制度。隴西李氏自認為是大姓，聽到這個風聲，恐怕入不了高門，於

是夜乘明駝，急速趕到洛陽。可惜「四姓已定」，所以被人戲稱為「駝李」。與印度不同的是：三世公者曰「膏梁」；有令、僕者曰「華腴」；尚書、領、護而上者為「甲姓」，九卿、方伯者為「乙姓」，散騎常侍、太中大夫者為「丙姓」，吏部正員郎為「丁姓」，就像強盜分贓一樣。但畢竟和印度國情不同，他們相互間也不容易買賬，於是又「定以博陵崔、范陽盧、隴西李、滎陽鄭為甲族」。最後越來越多，「大率高下等，通有百家，皆謂之士族，此外悉為庶姓，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」。

門第觀念一直影響到了後世，《西廂記》中，老夫人也因為「雖然不是門當戶對，也強如陷於賊中。」所以願意：「兩廊不問僧俗，如退得賊兵的，便將鴛鴦與他為妻。」在老夫子眼中，這自然是門不當戶不對的權宜之計。只不過這種做法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。南朝梁沈約的《奏彈王源》中說：東海王源將女兒嫁給富陽滿氏，「源雖人品庸陋，賈實參華，現在兩家聯姻「士庶莫辨」竟然成了「實駭物聽」的嚴重事件了。

唐朝高士廉奉詔撰修《氏族志》，也因襲魏晉南北朝舊例，以李姓為第二，唐太宗大怒。最後以隴西李氏、趙郡李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范陽盧氏、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，並稱「五姓七族」，宰相的李義府因不屬「五姓七族」，要為他兒子向河東崔氏求婚時，也遭到了拒絕。

柳宗元出身於河東柳氏，所以稱「柳河東」。杜甫從他祖父起，就由襄陽遷居河南鞏縣，卻自號「杜陵野老」、「杜陵布衣」，是因為關中郡姓杜首；韓愈是河內河陽人，卻自謂郡望昌黎，世稱「韓昌黎」，也因為昌黎韓氏門第比較高，他們都不能免俗。門第高了，不管它是否已經腐朽、老化了，多少還是可以自以為了不起了。蘇東坡遇上怕老婆的陳造，寫了一首詩譏笑他：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」。陳造的夫人，就出自河東柳氏。